

小说史之外的夏志清

□ 计璧瑞



夏志清(1921-2013)

夏志清先生去年岁末辞世,是海内外中文学界的一大文化事件,令人再度回忆起他的著述曾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新奇图景,毕竟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之前,很多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锺书的名字。这部享誉海内外的著作无论曾引发多少争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论述版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却是无可置疑的;它在西方汉学界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的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享有盛誉,他所表述的概念,如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如同“盛唐气象”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特质的经典描述。哈佛大学中国小说研究者韩南(Patrick Hanan)认为:“毫无疑问,夏志清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还有多部文学论集问世,从70年代到新世纪,先后出版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论中国文学》(英文本选集)等。这些著作除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论述外,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包括重要文学家和师友文章等,其中台湾文学批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那些文学家评述和师友文章,如《胡适杂忆》序》《悼陈世襄》《重会钱锺书纪实》《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等,兼有人物评传、事件纪实和作家论的特点,同样显示了作者的批评视野和立场。这些论述最初多见于台湾的各大报刊杂志,基本内涵既延续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观和基本立场,又有所调整,突出了浓厚的现实关怀和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分析评价,在台湾文坛和海外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文学论集简体字版的陆续编辑出版,为更多的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读者提供了更全面认识夏志清文学论述的机会。

收入《新文学的传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对18年前英文原版部分观点的重新解释,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夏志清文学批评观念有所调整的说明。《中国现代小说史》将“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的原因归于对宗教的不感兴趣和无意识认识的观点,在随后的研读与思考中逐渐发生改变:“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说是得风气之先。”《中国现代小说史》“文学革命”一章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嘲讽和“取笑”也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有所调整,陈独秀肯定的文学“活的传统”和“国民文学”与“社会文学”也成为夏志清肯定的对象。在文学评价的标准上,人道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文学批评不断强调的主旨而一再出现:“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屈从权势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小说史中译本序》)“我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读中国现代文学,读到旧社会的悲惨故事,我总不免动容,文字的好坏反而

是次要的考虑。只要叙述是真情实事,不是温情主义的杜撰,我总觉得有保存价值,值得后人阅读回味。”(《人的文学》)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思想不成熟,但他们关注青年的苦闷,老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存亡问题,其写作动机是绝对严肃的”(《正襟危坐读小说》)。现代作家“向往原始人性——他们基于人道主义而对人民迫害者所怀的愤怒,也是十分显明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按照夏志清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小说史》“文学革命”一章和《人的文学》对读,“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上之转变”。

当然,夏志清对文学艺术标准的执着依然如故:“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我写文学评论,一向注重作品本身。”“这份尊重文学艺术的执着,是积习使然,永远改不过来。”他一贯认为,“一般而言,最佳的文学作品较多关注永恒的人类问题,较少关注短暂的时事问题。”他甚至担心对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强调可能会引发他人的误解,“以为我放弃了小说是‘艺术’的看法,只要叙述‘真情实事’就够了”。但是这种观念的调整仍然影响了夏志清文学批评对文本精神内涵的评价标准。

虽然夏志清所肯定的人道主义文学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内涵基本一致,与左翼思潮的大众关怀有所不同,但它使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了认同,也使其对新文学的不同思想倾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其实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存在对部分左翼作家文学成就的正视,对张天翼的肯定就是一例;《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亲情与爱情——漫谈许地山、顾一樵的作品》一文对并非大作家的顾毓琇也未因其晚年倾向大陆而否定他早期的小说。人道主义精神还意味着强烈的当下意识和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具体体现在台湾文学批评上。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夏志清现代文学批评最为活跃的时期,台湾文学是这些批评的着力点之所在,他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召集学者讨论台湾文学的人。这一时期台湾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针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夏志清以他的身体力行实践和引领了当代台湾文学的批评行动,在作家作品评论、台湾文学奖评选活动和各种小说集序言中,都可见他细致中肯的分析和判断。《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为刘绍铭主编《台湾短篇小说选》英文本导言,论述了60年代台湾11位优秀小说家的创作,“主要

借以显示‘新文学传统’在台湾所表现的新活力。”文章首先将这些小说与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加以对照,注意到时代潮流的变化在小说写作上的影响。60年代的台湾小说开始关注台湾本土,“表现出地方性,以本省为本位”。但是这些生活在台湾的作者“虽然与30年代的作家在意识形态、心情,以及地区关注之大小各方面都有不同,他们却与那些前辈一样,特别关心年轻人及穷人。这两代小说家都把感情移注到故事中那些年轻知识分子身上,同情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改善世界的渴望,或是对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绝望”,“这是现代中国小说精神延续的明证”。同时,夏志清还注意到黄春明、王禎和等乡土小说作家为表现底层人的生存尊严所做出的努力,指出“当今台湾小说中有两个世界并存——一个是绝望的知识分子世界,一个是人道主义式充满希望和乐观的世界”。当时恰逢乡土文学运动时期,实际上,夏志清对各种文学论争并不感兴趣,对乡土文学论争也持保留态度,他所理解的“乡土”包含中国所有的区域,他“不愿放弃中国是一个整体的理想”。这更加说明他对乡土文学的理解是从人道精神和中国新文学传统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对台湾小说人道精神的肯定,完全出于他的一贯主张。无论是对乡土小说的嘉许还是对小说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和存在主义意识的发现,这些评价均显示了批评家对文学格局的精准把握和概括,它们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夏志清虽身在海外,但对台湾文学的理解如此准确深入,正是他社会关怀和文学关怀的写照。

夏志清的台湾文学批评以作家作品论见长,对当时重要的台湾作家,如琦君、余光中、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都有专论。而参与台湾两大报小说奖评选,则是他擢拔文学新人,以实际行为影响台湾文坛的标志。《正襟危坐读小说》和《二报小说奖作品选评》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他所参与的两大大报小说奖候选作品的得失优劣,所有的分析均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批评不留情面,褒奖细致贴切。由于他具备深厚的中西方文学素养,长于将批评对象放在世界文学视野和中国文学脉络中考察,加之新批评方法与社会关怀相结合,因此使评价和判断历久弥新。总之,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有着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二是继续坚持人道主义精神。

夏志清批评的个性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早有突出表现,独具颠覆性的文学史架构和评价标准,言人之所未言的胆识等等其实都是个性的体现,这一点相比众多集体写作的文学史来说至为明显。尽管被认为不乏偏见,但或正如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刘若愚先生所言:“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夏志清自己也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在批评对象和标准的选择上始终如一。批评个性在具体表述上体现为鲜明的个人性情,不时加入自己的人生感受,且时常臧否人物,直言不讳。一些原为英文的论文略带翻译痕迹,但中文论文则生龙活虎,夹叙夹议,虽引经据典却并无学究气,令人兴趣盎然而不忍释卷。他的文学趣味偏爱讽刺与幽默,其批评行文也不乏这种偏好。1976年他曾因传闻钱锺书在文革中离世而写《追念钱锺书先生》一文,后发现传闻不确,面对这一“乌龙”事件,他也以博学幽默来化解:“假如钱尚在人间,我‘追念’他,当然是大不敬。”但是,他举陶渊明和英国文豪斯威夫特的自祭诗文之例解嘲,“中外文人真有幽默感的,不怕人咒他死的。钱锺书早年爱写冷讽的幽默小品,斯威夫特的诗文他一定很爱好。他如能看到我的‘追念’文,想不会生气的。”1979年的《重会钱锺书纪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无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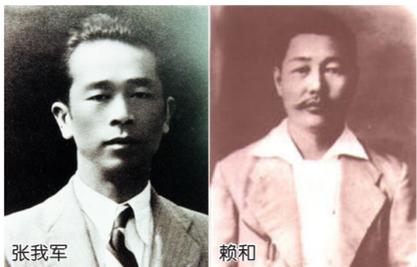
纪念夏志清先生其实也是纪念我们曾经的文学时代,他以文学史论述参与了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历史进程,以其批评论述影响了当代台湾文坛;改变了不止一代人的文学观念,这种改变不会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当今海内外中国文学批评界不乏夏志清的后继者,他们在材料储备等各方面要优于夏志清的批评时代,但夏志清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和他发现问题的方式与眼光仍然发挥着影响力,诚如王德威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中所言:“今天不论我们重估鲁迅、沈从文,讨论张爱玲、钱锺书,或谈中国作家的‘失根’之痛,再到今天以严歌苓为代表的‘一代飞鸿’的广袤移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也是文学变迁的内在轨迹。令人敬佩的是,在《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一书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联想和对比资料,从而使思考打破了传统的藩篱,在丰富的立体结构中具有了逻辑判断的力度。”

很显然,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河对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成长,对内则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海外华文文学的可贵,首先在于解除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从而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海外的华文作家,不仅仅是“乡愁文学”的代言者,更是“个体生存方式”的探求者。正因如此,蔚然可观的“中华文学”正在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大潮造就着一个双向刺激、双向互补的局面,可谓和中有异,异中有同,海内外共同奏响着新世纪华文文学登台国际舞台的交响乐。

小聚他乡感慨新

——读张我军赠赖和诗

□ 何 标



张我军 赖和

1939年8月,张我军曾向旅游北京的赖和赠七言律诗3首。此诗载于台湾出版的《叶荣钟全集》,未收入北京出版的《张我军全集》。诗的序文和诗文转抄如下:

燕都赠赖云兄并请转致乡诸友

余去家十有四年,一事无成,徒增乡愁。每遇乡中故旧北上游历,道经燕都一叙,颇为勾起满腹牢骚。近者赖云兄偶游燕都,见面竟不相识。谈及乡中故旧,互为唏嘘者久。爰作三绝以赠赖云兄,并请转致乡中诸友,聊表年来心境而已。唯此阙不弹已久,工拙在所不计也。

一九三九·八·八立秋之日写于北京 张我军

一去乡关十四年,文章事业两如烟。
故人相见询名姓,相对无言但惘然。

二

频年悒悒滞都门,松菊于今恐未存。
欲在梦中寻旧径,万山千水阻归魂。

三

栖迟倦鸟怯征尘,小聚他乡感慨新。
亲友若还相询问,年来事事不如人。

台湾著名老作家赖和(字懒云)与台湾新文学运动先驱张我军(先父),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抨击盘踞台湾文坛的旧汉学。曾在当时的《台湾民报》发表文章相呼应。1926年1月,我的双亲自台北南游时,在彰化与赖和相识。

此后,先父母脱离日寇统治,来到北京读书定居。不料日寇侵占东北后直逼华北,1935年先父出于报国之心,放弃教职,应邀协助北平市长进行对日交涉事宜。“七七”事变发生时,先父因是台湾省籍,“忠而见疑”,竟被国民党官员抛弃于沦陷区。当时全家六口的生计全靠家父一人支撑。这应是诗中提及的“文章事业两如烟”、“频年悒悒滞都门”和“勾起满腹牢骚”的主要原因吧。

先父对故土和乡亲情感深厚。在北京读书时被选为“北京台湾青年会”主席,并与同乡创办《少年台湾》月刊,在京间架起文化沟通桥梁。他热心于台胞公益事业,经常接待、资助、留宿来京乡亲。但他对乡土故人的思念,却因日寇的据台侵华,而“欲在梦中寻旧径,万山千水阻归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赖和伯行医的诊所被迫停业半年。遂趁机假道日本,到祖国大陆东北和北京等地一游,在北京与先父邂逅。那时离他们在彰化初识已过去13个年头,赖和伯已把又疏又长又细的八字须,改成上层浓密的短须;先父因心情郁闷和家庭重担拖累,早已失去青春光彩,所以“见面竟互不相识”。但毕竟故友“小聚他乡感慨新”,“谈及乡亲故旧,互为唏嘘者久”。

读此诗可知,先父当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积压于胸中的郁闷时日已久。借与赖和伯“他乡遇故知”之机,沉潜内敛地表露心迹;倾诉无限缠绵之乡愁,并希望家父老故旧,了解自己之处境,以慰藉相互思念之深情。

书 评

《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

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 陈瑞琳

进入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成就斐然的写作阵容,通常被学术界分为五大版图,即台港澳文学、东南亚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华文学及澳华文学。在这五大版图之中,最早被研究者瞩目的首先是台港澳文学,之后推向东南亚地区。近年来北美华文文学成绩凸现,无论其历史的深厚积淀还是作家作品的发展数量,都一跃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基地。

在“全球视野”下,华文文学正处在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前沿,尤其是北美文学,创作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亟待研究者发掘与整理。但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多以英语文学为主要研究课题,华语文学则只能被列为少数族裔的文学,很难进入学科研究的重点。可喜的是,这个庞大的崭新课题如今正在国内学界的推动下剥茧抽茧地展开。2013年由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一书,正是一部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全面开拓之作,其历史的纵向开掘及横向的作家流派研究,都具有突破意义,其作者则是来自西安的王亚丽。

2010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王亚丽。她兴奋地告诉我,导师鼓励她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她决定以北美华文文学作为博士毕业论文题目。看着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年轻女子,在广袤的学术草原上要选择走一条未经开垦的荆棘之路,那一刻,我忽然有令人惊喜地预感,在西安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新一代学者放眼世界,以他们穿越时空的目光,将东西方的文化长河打通,架起新的文学桥梁。

2012年夏天,在西安古城墙下的幽静茶室里,亚丽呈现给我厚厚的《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一书的初稿。亚丽说:“做开拓者虽然是辛苦的,但却是值得的,与其在前人开垦了无数遍的领域里咀嚼他人的残渣,不如自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我在欢喜之际,也直接向她指出了书稿的不足,比如对北美“草根文学”的研究上有明显的资料匮乏,另外,关于北美的纪实文学、网络文学、报刊文学、社团文学等领域的关注还相当不够等等。但我相信,她的学术架构已经建立,这些都是有待加上去的砖瓦,未来还可继续“跨越”。

《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立意的可贵,是首先看到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共性。全球各大版图的华文文学,虽然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同时都具有着“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们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抵抗失语,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这样的多元文化精神架构,所以当他们在海内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就产生了对“离散”美学理想的共同追求。

在王亚丽的整体论述中,她抓住了海外作家“边缘书写”的精神特质,找到了“文化认同”的内在通道。特别是能够从历史的溯源脉络上梳理出海外华文文学跨文化的意义,达到了当今华文文学研究崭新的理论高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方面剖析异质文化的内涵冲突,一方面深

刻地阐释了家园记忆的乡愁想象和故国书写。与此同时,她创造性地发掘了在“性别意识”下完全不同的文化认同危机和心理特征,尤其是对男性作家的分析非常独到到位。她甚至还涉及了“城市书写”、“唐人街的文学意义”这些极具学术挑战的新领域,对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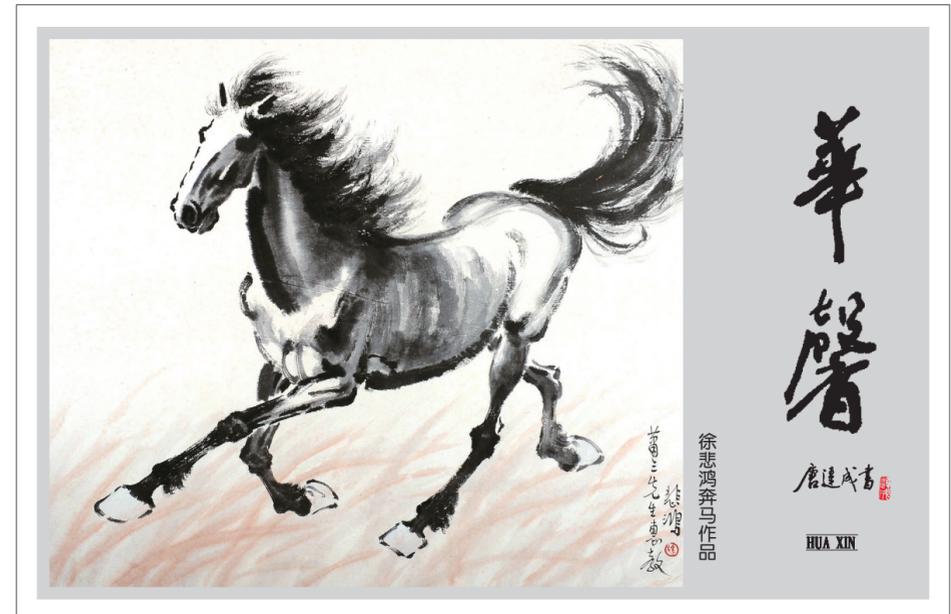
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背景,王亚丽在书中做出了清晰的整理和论述。她以纵向的宏观视野,精确地把握了中国对世界的早期贡献,以及华工、留学生、新移民对美国的贡献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研究中,她看到了北美华文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三个主要浪潮,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北美“新移民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收获。

宏观地研究北美华文文学,还必须打开两个通道,一个是打通北美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另一个是打通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波澜,它们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源头和先声。只有站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坐标系中,才能深入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跌宕起伏以及内在继承的精神脉络。在王亚丽的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中,她特别注意到了历史的纵向线索以及横向的交接脉络。她不仅系统地研究了北美“草根族”文学的奠基,以及台湾的“留学生文学”

和大陆的“新移民文学”,还看到了来自近现代文学史上海外作家的先声。

回首北美华文文学的百年耕耘,正是由早期的“草根”族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科技“新移民”,由旧金山老作家黄运基时代的“海外孤儿”到台湾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的“失根”之痛,再到今天以严歌苓为代表的“一代飞鸿”的广袤移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也是文学变迁的内在轨迹。令人敬佩的是,在《跨文化视野下的北美华文文学》一书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联想和对比资料,从而使思考打破了传统的藩篱,在丰富的立体结构中具有了逻辑判断的力度。

很显然,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河对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成长,对内则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海外华文文学的可贵,首先在于解除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从而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海外的华文作家,不仅仅是“乡愁文学”的代言者,更是“个体生存方式”的探求者。正因如此,蔚然可观的“中华文学”正在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大潮造就着一个双向刺激、双向互补的局面,可谓和中有异,异中有同,海内外共同奏响着新世纪华文文学登台国际舞台的交响乐。



徐悲鸿奔马作品 唐建成书